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中央政策組

《移動與福利：
內地孕婦赴港產子的家庭策略研究》

中山大學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

2011年12月

移動與福利：
內地孕婦赴港產子的家庭策略研究

中山大學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 黎熙元 潘自心
中山大學新華學院經貿系 劉洋

2011年12月

摘要

近年內地孕婦赴港產子個案迅速增加，引起香港各界關注。本研究基於 31 個家庭個案的深度訪談資料，對內地赴港產子家庭的特徵、動機、家庭策略及其社會影響進行了細緻的分析。

赴港產子的內地孕婦具有以下家庭特徵：以二孩家庭為多，夫婦都是所居城市的戶籍居民，受教育程度較高，職業地位較高，屬於城市中等或中上階層居民，大部分家庭都有至少一個內地出生的孩子，在香港所生的孩子是家庭的第二個或第三個孩子。內地家庭對赴港生子動因的排序是：家庭逃避計劃生育規制為首選，其次是為孩子獲取香港公民身份，第三是孕婦獲得優質生育醫療服務。對於與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相關的法規以及這個身份能夠帶來什麼好處，受訪者明確提到兩點，其一是持有香港居民身份出國免簽證，方便將來留學，其二是香港永久居民的醫療福利和能夠獲得的醫療服務素質比內地好。受訪個案中港生孩子出生之後無一例外被帶返內地撫養。半數家庭不考慮或當前沒有計劃在未來把港生孩子送返香港入學，另一半家庭父母會考慮把港生孩子送返香港就學，但多選擇在中學、孩子能夠自我照顧以後（父親是香港永久居民的家庭則會考慮送返孩子入讀小學），內地父母基本上不考慮以監護人身份或其他訪客身份在香港生活以撫養孩子或陪讀。

從這些認知、動因與決策來看，內地家庭赴港產子的根本目標不是家庭成員未來能夠在香港居住、成為香港永久居民，而是家庭能夠在香港與內地所實施的不同制度之間尋求最大化家庭福利。由制度差異產生的相對福利只能通過移動來佔用，固定在任何一地都會失去比較利益，所以家庭有必要保持生活策略的靈活性。在充分考慮到家庭財務能力、家庭照顧與支持、制度許可和資訊充分性等因素之後，內地家庭通常運用這些家庭策略：（1）動員跨越兩地的親友網路支援；（2）同類家庭組成社會網路和互聯網社群共用資訊資源；（3）借助商業仲介獲取所需的（而不是全套）服務；（4）對港生孩子的

教育採取多樣化的權宜策略，可能的方式包括：在內地完成學業、跨境就學、中學階段送返香港、直接送海外留學。

赴港產子家庭增加了內地社會的多樣性。內地家庭對港生孩子未來生活設想的多樣性反映出這些家庭未來生活的不確定性增加。內地家庭赴港產子的初衷只是多生孩子，但港生孩子的存在不但增強了家庭注意和考慮利用香港與內地制度差異產生的福利空間的必要性，也增加了付之實踐的可能性，促使家庭在利益權衡之下對去與留、連結與斷裂之間不斷選擇。赴港生子導致了家庭中存在兩種成員身份，這些家庭成員因持有不同居民身份在內地生活而會有不同的地位與經歷，而兄弟姐妹之間的身份差異則增加了家庭關係的複雜性。赴港產子家庭構成的社群有不同於其他家庭的利益關注點，也增加了社區的多樣性。

相對而言，赴港產子的內地孕婦與香港孕婦之間的緊張關係似乎更為引人注目，即使香港孕婦所感受到的擁擠存在於象徵的意識形態衝突多於實質的資源競爭，這種緊張關係甚至蔓延到香港社會，構成香港人與內地人緊張關係的因素。內地孕婦或多或少能夠感受到這種緊張關係，她們覺得難以理解。她們認為自己不但按章交費，而且為香港帶去大額相關消費，這種消費應該對香港有利，因此而受到指責是非常奇怪的。

內地家庭赴港生子行動產生了一個長期生活於內地卻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去留不定的人口。對香港來說正常情況下這種長期在境外生活的人口所產生的福利負擔其實比他們在香港生活所產生的福利負擔更小。港生孩子長大後返回香港對香港人口年輕化具有正面的影響，這些在內地受過一定程度教育的孩子，對內地社會制度的理解一定比完全在香港長大的孩子更多，在香港與內地相伴發展領域或行業能夠起正面的作用。但是，內地孕婦赴港產子可能造成香港醫療短期“擁擠”，而且港生孩子一旦在集中時間內返回香港可能對香港教育、醫療、就業和房屋等領域構成一定壓力，香港政府需要提前考慮

應對措施，而香港社會則需要考慮外來人口增長與本地發展速度和發展方式的關係，以及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現行獲得方式對外來人口增長的影響。

赴港產子代表一種跨境人口再生產方式，展現出導致人口空間移動的因素不僅有收入、機會差距等經濟因素，也有制度差異的因素，由於制度本身的多變特性，使人口移動更加頻繁、多向、不確定。赴港產子家庭所構成的社群跨越香港與內地兩個社會，根植於兩個社會但又隨時準備分離，這個社群不是由於移民而外生的，而是內地社會內生出來的一個“異己”。它的生成與存在形態展示出移動社群不但往返移動於不同社會，也嵌入於它所往返的社會，前者已為社會學者所熟知，後者卻是一個新的社會學論題。內地家庭在赴港產子之前、之中、之後的實踐全程，充分展示出社會網路運作的靈活性和策略性，也說明了中國家庭具有組合的靈活性，並不簡單跟隨傳統或現代的社會變化而改變。

常言道同胞關係血濃於水，這話雖然有過於籠統之嫌，但也準確指出了香港居民與內地居民之間一直存在的親緣和地緣關係，不少赴港產子的內地女性其實是聽從其在香港親友的建議，而這些親友亦提供實質的支持。香港與內地的經濟融合使兩地人、物的對流越來越頻密且大量，這種市場的相互開放實質地推動了雙方經濟增長和政府福利供給能力的增加。在此過程中也必然會發生資源競爭、利益競爭的狀況。人與物的大量往返移動使香港或內地都無法再憑籍居民身份和地理邊界的劃分來緊緊保衛自己社群的利益，而兩地政府也不能再僅僅通過邊界來實施控制與管治。制度差異產生的福利空間只能通過制度改變來消弭。換句話說，內地孕婦赴港產子不是一個“控制”的問題，而是一個“調節”的問題。赴港產子的內地家庭和港生孩子是一個跨越兩地社會的新社群，它的生成帶來的應該是民間進一步融合和瞭解、政策和制度的適應力進一步提高，而不應該是兩地衝突和敵視。